



海上交通与“乘桴浮于海”新证

王进锋

摘要:《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的“海”意为“海外”。从语境来看,它非泛言,而是实指。关于它的具体所指,历代学者多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当时人的海外观和齐鲁之地的航海能力两个崭新的角度,来论证解决这个问题。“海外”指四海之外,即君王或天子统治区域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孔子时代的齐鲁之人有着较强的海上交通能力,他们尤其和朝鲜有着密切联系。综合来看,“乘桴浮于海”中意为海外的“海”即指朝鲜。孔子在学术主张得不到推行的情况下想去朝鲜,可以得到《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的辅证。他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受到了商末箕子事迹的启发。

关键词:《论语·公冶长》;海;桴;注疏;九夷;朝鲜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5-0099-07

历来学者对于《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海”及相关问题的认识有争论。对其辨明,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同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管窥当时的海上交通、中外交流和世界认识等。

一、前人对“乘桴浮于海”的释读与争论焦点

《论语·公冶长》记录了如下一段文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1]2473}

上文记录的是孔子在学术主张得不到推行的情况下,对自己去处的思考。

关于“乘桴浮于海”中的“海”,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解释。如皇侃所提及的某家说法:“孔子为道不行,为譬言我道之不行,如乘小桴入于巨海,终无济理也。非唯我独如此,凡门徒从我者道皆不行,亦并由我故也。子路闻我

道由,便谓由是其名,故便喜也。孔子不欲指斥其不解微旨,故微戏曰:汝好勇过我,我无所更取桴材也。”^{[2]56}按:多数学者都认同“乘桴浮于海”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旨趣相同,因而可以通过这两处语境来联合验证某种说法是否正确。此家的解释勉强能够说通“乘桴浮于海”一句,但并不能说通“子欲居九夷”,因而并不正确。《东塾读书记》斥其为“不通”^{[3]301},甚是。

有学者将“乘桴浮于海”中的“海”理解为“大海”“海上”或者“海中”。如:张居正认为是“不如乘着木筏,浮于海中,可以绝人而逃世”^{[4]58}。毛子水认为是“我想坐筏子漂浮海上”^{[5]62}。李泽厚解释这句话为“坐木排到海上漂流去”^{[6]126}。李零则释为“真想找个小木筏,漂流大海上”^{[7]116}。李智福认为是“归隐大海”^[8]。按:这种解释没有交代要去往的地方,应指一直漂流在海上。事实上,短时间漂流在海上不着陆是可以的,但若长久如此,既无法保全性命,又无法推行学说主张,还耽误了学生子路,恐非孔子本意,所以这种看法也不正确^①。

收稿日期:2021-06-02

作者简介:王进锋,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上海 200241),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学者都将“海”理解为“海外”。如:康有为认为孔子“欲出海外”^{[9]58}。钱穆解释为“我想乘木筏,漂浮到海外去”^{[10]117-119}。杨伯峻释为“我想坐个木筏到海外去”^{[11]49}。南怀瑾解释为“那只好做个独木舟,到海外野蛮的地方归隐”^{[12]184-185}。何新认为是“就乘个木筏漂浮到海外”^{[13]51}。金良年认为是“乘着木排漂洋过海”^{[14]42},也将“海”看作“海外”。按: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在“道不行”的情况下,乘桴到“海外”去,或者推行主张,或者归隐,可进可退,应是孔子的本来想法。

此处孔子意指的“海外”,历来多数学者都认为并非泛言而是实指^②,如:刘宝楠所言“夫子当日必实有所指之地,……非泛言四海也”^{[15]170-171}。那么,“海外”具体指何处?学者有不同解释,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九夷所居之地,如邢昺。他解释这句话为“欲乘其桴楫浮渡于海而居九夷,庶几能行己道也”^{[1]2473},将海外看成是九夷所居之地。皇侃看法相同,他解释这句话为“孔子圣道不行于世,故或欲居九夷”^{[2]56}。刘宝楠提出“浮海指东夷,即勃海也”^{[15]170-171},认为海是渤海,海外指东夷。黄式三认为“过海至东夷也。……‘乘桴浮海’即‘欲居九夷’之事。鲁地近东海,九夷在东海之外”^③。刘、黄的看法都与邢昺相同。

(二)玄菟、乐浪之地。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描述道:

玄菟、乐浪,武帝时置,皆朝鲜、濊貉、句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④

班固认为孔子“乘桴”欲去往的海外,相当于汉代的玄菟、乐浪郡。杨树达也持此说^{[16]118-119}。按:看法“(一)”“(二)”,虽表述上有所差别,但本质是相同的。

(三)吴、越之地。王夫之在《四书稗疏》中提出“一筏之汎,岂犯鲸波陵巨洋者乎?夫子居鲁,沂、费之东即海也,其南则吴、越也。夫子此叹,伤中国之无贤君,欲自日照通安东、赣榆适吴、越耳”^{[17]29},则他认为海外是吴、越之地。

(四)理想寄托的场所。朱春洁认为“‘海’在《论语》中不仅是字面上的‘海洋’之意,同时也是孔子的理想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而予以寄托的一个场所”^[18]。

按: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四海之外”的概念,指四海以外的地方或其他国家。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记载了商汤和伊尹的对话,伊尹提到了“四海之外”:

小臣自堂下授流羹。纣流受小臣而尝之,乃昭然四荒之外,无不见也。小臣受其余而尝之,亦昭然四海之外,无不见也。

此处的“四海之外”即指君王统治区域以外的其他地区或国家^[19]。《管子·宙合》:

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

注:“宙合,广积善以通天上,入地下,包络天地为一裹也。”^{[20]236}这里的“四海之外”即指四海之外的所有国家。

“海外”即“四海以外”,指四海以外的国家或地区。《诗经·商颂·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传:“相土,契孙也。烈烈,威也。”郑笺“截,整齐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业,入为王官之伯,出长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而整齐”^{[21]172}。四海之外的国家都来朝拜,可见相土功业的威武。这里的“海外”就是指四海之外的国家。鲧和禹治国的時候,采取了不同的方针,“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⑤,两处“海外”都指海外的国家。禹因为治国措施有成效,所以“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氏、羌来服”^⑥，“海之外”指四海之外。《山海经》“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中的“海外”指四海之外;而《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大荒南经》“东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中的“东海之外”是“海外”的具体化,也指非中原之地。

孔子的“海外观”,与先秦时期人们普遍的“海外观”一致,指四海以外的地方或国家;更进一步说,指君王或天子统治区域以外的地方或者国家。据之,以上“(三)”的解释并不正确。

那么,在其他三种解释中,究竟哪种看法正确?或者还有别的解释?孔子作为齐鲁之人,他对海上航行和海外的认识,必然建立在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人们普遍的海上交通和海外交往能力基础上。因此,若要辨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孔子时代齐鲁民众的海上交通能力。

二、孔子时代齐鲁民众的海上交通能力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齐鲁民众的海上交通能力十分突出。

由于“至于海邦”^①——即边界到达了海边,孔子时代的鲁国人对海洋比较了解。曾经有名为“爰居”的海鸟,飞到鲁国,“止于鲁东门之外三日”,鲁国人展禽据之预测“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后来果然,“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22]154-161}。展禽准确预测的背后是鲁人海洋知识的丰富。

当时齐国民众的海洋知识更加丰富,海上交通能力也更突出。管仲曾自诩齐国为“海王之国”^{[20]1246},即依靠从大海中获得的利益来称王^②。这当然是建立在他们对海洋熟悉的基础上:既包括他们了解海中资源,又包括懂得航海技术。《管子·戒》“(齐)桓公将东游,……南至琅邪”^{[20]507},齐桓公的这次东游是通过海上航行实现的。春秋末年,齐景公对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23]119},齐景公的这次长距离出行,也是通过海上航行来完成的。《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谓“齐景公游少海”^{[24]306}。“少海”即渤海,齐景公游渤海是建立在齐国高超的航海技术基础上的。《说苑·正谏》记载:“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③论者指出:“齐景公泛海六个月,虽然估计并未远离海岸,但不可能六个月中都是好天气,这说明贵族所使用的海舶已经相当大,而且装备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抗风浪能力,以致乘这种海舶出游成为一大乐事。”^{[25]7}甚是。齐鲁之人建造船只的能力和航海技术之强,从这则材料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④。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命“徐承率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⑤,可见齐国有强大的海军,这也是齐国有航

海能力的体现。由于他人的潜陷,晏婴一度遭到齐景公的猜疑,于是他“辞而不为臣,退而穷处,东耕海滨”^{[26]361}。晏子选择退处海边耕种,也是因为他对海洋的熟悉。

齐鲁之地的之罘、成山、琅琊在春秋时已经成为海港。《管子·戒》记载齐桓公“东游……南至琅邪”^{[20]507},而《孟子·滕文公下》记载齐景公“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焦循注:“转附”即之罘也,“朝舞”即成山也^{[23]120}。之罘、成山、琅琊当时都是著名的港口,因而齐桓公、齐景公想沿着海岸线游览。海港的形成也有利于当地民众的海上航行。

齐鲁之人的海洋知识、建造的船只、海上航行技术和海港的形成,为普通民众的海上航行提供了便利。南北朝时期流传一则故事说:“昔鲁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见仲尼及七十子游于海中。”^⑥虽然有些怪诞,但也说明在孔子时代诸如鲁人、孔子、七十子这样的普通民众已经能够进行海上航行。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时代齐鲁之地的普通民众,通过海上交通能比较容易地到达朝鲜。

齐桓公与管仲之间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筭,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礪磬,一筭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筭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筭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20]1382-1383}

朝鲜的发、文皮能传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必然要通过海上交通。当时交通之便利,能够使朝鲜的物品很容易地流通到齐国市场,满足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使“朝鲜之文皮,一筭也”成为普遍认同。《管子·轻重甲》也记载: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于天下而伤寡人,寡人之行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后八千里之发、朝鲜可得而朝也。……故物无主,事无接,远近无以相因,则四夷不得而朝矣。”^{[20]1440}

朝鲜的发、文皮也是通过民间的海上交通流转到齐国的。《尔雅·释地》记载:“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27]2615}《尔雅》虽然是汉初成书,但是这个记载应是春秋战国以来史实的

反映。斥山位于荣成南部石岛港西北,属于齐地。斥山“没有虎豹生存的条件,能出产虎豹皮的可能性极小。……斥山的文皮是从外地输入的。……斥山应该是朝鲜文皮进入中国的主要集散地,否则斥山有文皮的名气就不会那样大”^[28]²⁸。可见,当时的朝鲜和齐国之间有着比较便利的海上交通。

考古资料也能证明,当时齐鲁与朝鲜之间存在着人员流动与海上交通联系。在山东半岛的乳山、文登、荣成等地,考古人员发现了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期的“南黄庄文化”。墓葬形式非常独特,墓壁四周以石块砌成,再盖以大石板,石板上以石块封堵。这种形制与山东其他地区差别很大,却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比较常见的石棺墓相似。说明二者间有着一定联系^[29],而这种联系是通过人员流动来带动的。韩国上林里出土了很多东周时期的“中国(吴越)式铜剑”,说明当时有很多吴越地区的铸剑工匠东渡到了朝鲜半岛。他们东渡的路线是先从吴越地区来到山东半岛,再从山东半岛北端的蓬莱和庙岛群岛,穿越渤海海峡,再经过辽东半岛南端,到达黄海的西朝鲜湾,然后由此南下,经由江华湾,最终到达朝鲜半岛西南部沿海地区^[30]。另外,日本西海岸出土了350件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铎,“说明早在2700年前,中国的海航先驱者,已经开辟了从山东半岛出发,经朝鲜半岛,再东渡日本的航路,并把中国文化传入朝鲜和日本”^[31]。这两条航线虽然航程不完全相同,但都连通了山东半岛和朝鲜。那么,孔子时代的齐鲁之人当然可以通过这两条航线来东渡朝鲜。

上古时期,山东半岛有“嵎夷”。《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32]¹¹⁹、《尚书·禹贡》“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淮淄其道”^[32]¹⁴⁷⁻¹⁴⁸都是明确的证据。同时,朝鲜半岛也有“嵎夷”,如高丽人说自己“混迹于嵎夷”,认为自身是“嵎夷细民”^[33]¹⁴⁰³⁵⁻¹⁴⁰⁵⁶。实际上嵎夷最初是居住于山东半岛的,后来“由于中原华夏民族的东渐及在这一过程中的频繁战争,迫使相当一部分嵎夷人越海迁往”朝鲜半岛,而迁徙发生的时间主要在春秋时期^[34]。另外,在公元前567年齐国灭莱国的时候,“有大量(莱国)的贵族或难民通过海上避难朝鲜”^[28]³¹。还有,原位于海岱地区

的东夷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越海迁居到了朝鲜半岛^[34]。这些事例都说明当时的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海上交通到达朝鲜。

总之,在孔子时代齐鲁之地人们的海上航行能力很强,他们通过海上交通和朝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三、“乘桴浮于海”中“海”意指的海外即朝鲜

《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的“桴”,何晏引马融解释为“编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1]²⁴⁷³,可见“桴”是用竹竿或树木编成的浮筏。专门研究中国古代船只的学者指出:“筏有因地制宜、取材不拘一格、制作简单和稳定性好等优点。……它确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智慧结晶。……筏不仅供作渔猎和作为运载工具用来渡过大江大河,它甚至适于在海洋上漂流。”^[35]⁷⁻⁸

民族志方面的资料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国上古时期浮筏的形态。宋代陆游《入蜀记》记录了他在长江上所见所闻浮筏的情形:“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素不睹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园,或作酒肆。”^⑧其承载力令人惊异!这种浮筏当然是比较大型的,孔子时代一般浮筏的承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装承数个人和必要生活物资则不在话下。1826年,相关人员在曼迦温岛上发现了用于作战的浮筏,左右两舷各有多名划桨手。1954年,在台湾高雄茄荳发现了竹筏,由11根竹材捆扎起来^⑨。这些浮筏都挂有风帆,因而很好地解决了前进时的动力问题。学者们注意到,当地土著乘坐这类浮筏在海上一天能航行145英里^[36]。如此来看,浮筏的行进动力有保障,而行进速度也是比较可观的。更有实证价值的是,挪威人海尔达尔(1914—2002)做过长距离仿古航海实验。他在1947年用木筏运载着6个人和生活物资,从秘鲁海岸出发,经过97天的航行到达波利尼西亚的岛屿^[37]“译者前记”,16-262;他在1970年用埃及的原始芦苇舟,从埃及出发漂渡了大西洋;1977年他又用美索不达米亚的芦苇舟,从波斯湾漂航到北

非的吉布提^⑤。由这些资料来类推,孔子时代的普通民众完全可以利用浮筏,承载相应的人员和物资出海,而且还能安全到达海外。所以孔子所说的“乘桴浮于海”并非戏言,而是建立在当时人实际航海能力基础上的。

虽然如此,“桴”的交通条件毕竟无法与大船相比。从安全出发和到达来看^⑥,只能进行较近距离的海上航行。而在当时能通过海上航行到达的海外之地中,朝鲜距离齐鲁之地相对较近,同时又有密切联系。所以“乘桴浮于海”中的“海外”即指朝鲜。

关于“乘桴浮于海”一句中的“海外”指朝鲜,可以得到《论语·子罕》中相关内容的辅证。该篇记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2491}朱熹注“东方之夷有九种。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38]113}。《说文解字》载:“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有以也。”^{[39]290-291}《论衡·问孔》曰:“孔子疾道不行于中国,志(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40]416}可见此处的“居九夷”与《论语·公冶长》中的“乘桴浮于海”旨趣相同,都是孔子在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下,欲到外域去推行自己的主张。皇侃对这句话和“九夷”的注解为:

孔子圣道不行于中国,故讬欲东往居于九夷也,亦如欲乘桴浮于海也。……四方: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骊、四满饰、五鳧夷、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2]123-124}

可见九夷所居之地是朝鲜。刘宝楠也指出:“子欲居九夷,与乘桴浮海,皆谓朝鲜。夫子不见用于中夏,乃欲行道于外域,则以其国有仁贤之化故也。”^⑦可见“九夷”即指朝鲜^⑧。所有这些都证明,“乘桴浮于海”中的“海外”指朝鲜。

孔子想去朝鲜可能是受商末箕子事迹的启发。

周武王灭商后,商朝旧贵族箕子率众来到朝鲜,《尚书大传·洪范》记载有此事:

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⑨

可见箕子在商朝灭亡后来到了朝鲜^⑩。朝

鲜早期的史书也有类似记载,金富轼《三国史记》提到“箕子受封于周室”^{[41]281},释一然《三国遗事》提到“周虎王即位乙卯,封箕子于朝鲜”^{[42]34}。箕子到达朝鲜后,还按照自身理念,对当地进行了成功的教化和改造,《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其中的细节: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筍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43]1658}

箕子教朝鲜人民礼义、田蚕、织作,还制定了相关禁令,极大地推动了朝鲜的开化与发展。孔子作为箕子的同族后人,当然对箕子事迹有所了解。他在中原地区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也想效法箕子到朝鲜去教化当地民众。

总之,《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意为海外的“海”确指朝鲜。

结 语

《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的“海”意为“海外”。它并非泛言,而是实指。关于其具体所指,历代注疏家和研究者颇有争论。而对其辨明,则需依赖对当时人海外观和齐鲁之地海上交通能力的考察。

当时人所谓的“海外”即“四海以外”,指四海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孔子时代的齐鲁之地有着较强的海上交通能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齐鲁民众和朝鲜之间的密切联系。孔子作为这个地区的人,他所说的话及其意指的对象,都是以这种海上交通能力为背景的。

从当时人的海外观和齐鲁之地的航海能力来看,《论语·公冶长》“乘桴浮于海”中意为“海外”的“海”即指朝鲜。孔子在学术主张得不到推行的情况下想去朝鲜,可以得到《论语·子罕》

“子欲居九夷”的辅证。孔子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受到箕子事迹的启发。

如此来看,班固、邢昺、皇侃、刘宝楠等人过去对《论语·公冶长》章的理解是正确的,而王夫之、朱春洁的看法并不能成立。我们此处的论证不过为前一批人的看法提供了新的证据。

扩展开来,对“乘桴浮于海”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为我们认识春秋末期的海上交通、中外交流和世界认识等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

注释

①《论语·微子》中有一句话的句式与“乘桴浮于海”相似,为“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它的含义是:少师阳、击磬襄到了海边。其中的“海”并不直接理解为“大海”或者“海上”或者“海中”。以此来看,“乘桴浮于海”中的“海”也可以不作这种理解。②从下文学者们对“海外”的解释可以看出,多数学者认为它是实指。更重要的是,“乘桴浮于海”与《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旨趣相同,而“九夷”明显是实指,那么“海外”当也非虚言。综合而言,此处的“海外”还是按照某个具体地方来理解更恰当。③(清)黄式三:《论语后案》,道光甲辰本。④颜师古注:“言欲乘桴筏而适东夷,以其国有仁贤之化,可以行道也。”见(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8页。⑤《淮南子·原道训》。⑥《大戴礼记·少闲》。⑦《诗经·鲁颂·閟宫》,见(汉)毛亨传,郑玄笺:《毛诗正义》卷二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17页。高亨:“邦,读为封。《小尔雅·广诂》:‘封,界也。’海封,犹海边。”见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23页。⑧《管子集校》所引尹知章语“负海之利而王其业”。郭沫若:《管子集校》(四),《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页。⑨(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九,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7页。《韩非子·十过》有不同的记载,谓:“昔者田成子游于海而乐之,号令诸大夫曰:‘言归者死。’”见梁启雄:《韩子浅释》,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5页。将出海者看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田成子”。⑩春秋末年,人们建造大型船只的能力,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记载中得到旁证。《越绝书·逸文》引《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记载:“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见李步嘉:《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18-419页。可见春秋时期吴国“大翼”船不仅尺寸大,而且还能承载很多人员,这些人员之间

还有一定分工。除了“大翼”,还有“中翼”“小翼”,它们的尺寸也不小。⑪《左传》哀公十年。左丘明撰、杜预集解:《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66页。⑫《太平御览》卷九百二十二引崔鸿《北[凉]录》。(宋)李昉:《太平御览》(第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86页。⑬(宋)陆放翁:《入蜀记》卷四,浅草区浅草须贺町十九番地,出版人:松崎半造,明治十三年,第7页。⑭凌纯声:《中国远古与太平印度两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楼船的研究》,台湾“中研院”民族所专刊16号,1970年,第78页。吴春明:《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南方文物》2008年第2期。⑮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陈泽加:《现代探险家海尔达尔》,《航海》1997年第5期。⑯孔子想去海外推行学说,他不可能冒着丢失生命的危险出海,而是有成功到达的把握的。况且徒弟子路还有可能跟随,他更不会做无把握的事。⑰(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44页。今人袁洪流也认为“子欲居九夷”中的“九夷”指朝鲜。见袁洪流:《“子欲居九夷”考》,《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夏之卷。⑱关于“九夷”,有学者有不同理解,如王夫之认为:“周衰典废,小国诸侯,国介边徼,惮于盟会征伐之重赋,不能礼备,自降而从夷,则人亦以夷目之,而鲁东海濊本有夷属。……则九夷者,东方九小国耳,以其僻小险鄙,降从夷礼,故曰陋。”(见王夫之:《四书稗疏》,《船山全书》(第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5页)“九夷”是海边的九个夷国,位于海内。按:海内的夷国,离齐鲁甚近,深受齐鲁影响。在齐鲁之地都推行不了的主张,在这些地方也一定推行不开,孔子当然明白此理,那么他心目中“欲居”的“九夷”肯定不是这些地方。所以,这些看法并不正确。⑲(清)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卷四《洪范》,光绪丙申师伏堂刊,第1页。⑳从这段材料还可以看出,箕子在中原与朝鲜之间来回了三次。这说明早在商末周初的时候,中原与朝鲜之间就有着比较便利的交通,而箕子极有可能就是从当时的东夷之地(即后来的齐鲁之地),通过海上交通到达朝鲜的。春秋末年的孔子当然也可以通过这条路径到达朝鲜。

参考文献

- [1]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3]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张居正.论语别裁[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 [5]毛子水.论语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

- [6]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 [7]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 [8]李智福.孔子“临流兴怀”之现象学考察[J].齐鲁学刊,2016(3):5-12.
- [9]康有为.论语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0]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 [1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2]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 [13]何新.论语新解:思与行[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 [14]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15]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16]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17]王夫之.四书稗疏[M].长沙:岳麓书社,2011.
- [18]朱春洁.《论语》中“海”的象征意义及生成原因[J].天中学刊,2016(5):58-62.
- [19]刘国忠.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伊尹间夏[J].深圳大学学报,2013(1):64-67.
- [20]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1]毛亨传,郑玄笺.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22]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23]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4]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5]刘迎胜.丝绸之路:海上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 [26]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7]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28]刘凤鸣.山东半岛东方海上丝绸之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9]李慧竹.汉代以前山东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交往[J].北方文物,2004(1):16-23.
- [30]白云翔.从韩国上林里铜剑和日本平原村铜镜论中国古代青铜工匠的两次东渡[J].文物,2015(8):67-79+1.
- [31]陈炎.海上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J].今日中国,2001(12):50-52.
- [32]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 [33]脱脱,阿鲁图.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34]刘子敏.“嵎夷”与“朝鲜”[J].北方文物,2005(4):60-65.
- [35]席龙飞.中国造船通史[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
- [36]吴春明.中国东南与太平洋的史前交通工具[J].南方文物,2008(2):99-108+53+93.
- [37]托尔·海尔达尔.孤筏重洋[M].朱启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 [3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9]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40]黄晖.论衡教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1]金富轼.三国史记[M].汉城:保景文化社,1991.
- [42]一然.三国遗事[M].汉城:瑞文文化社,1996.
- [4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Maritime Traffic and the “by Beam Floating in the Sea” in *Gongyechang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Wang Jinfeng

Abstract: The “sea” in “by beam floating in the sea” in *Gongyechang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means “overseas”. As to its specific meaning, scholars and researchers of the past dynasties have disp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us overseas view and the navigation ability of the State of Qi and the State of Lu, we can demonstrate and solve this problem. “By beam floating in the sea” means countries or regions beyond the seas, that is, countries or regions beyond the realm ruled by Kings or sons of heaven. The people of the two states in the time of Confucius had strong maritime communications, and they had close ties with Korea in particular. Taken together, “overseas” refers to Korea. This view can also be confirmed by other parts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Key words: *Gongyechang of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sea; beam; the appearance; nine reduced; Korea.

[责任编辑/知 然]